

国共两党间的秘密情报战

郝在今

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日起就十分重视保卫保密工作,可以说“有党就有情报保卫工作”,比国民党还早了一步。这是因为当年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非法地位,在地下状态中活动必须高度注意自身安全。

1925年,中共中央选派顾顺章、陈庚、陆渭3人到苏联学习,为今后创立情报保卫系统做准备。直到1927年5月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成立,共产党才有了专门的情报机构。特务工作科虽然只活动了3个月,却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最早的特工干部,此后成立的“中央特科”,骨干大多来自于此。

赫赫有名的“中央特科”

在中共中央情报保卫系统,“中央特科”赫赫有名。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再次转入地下。在周恩来的倡议下,1927年11月“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如果说,此前的特务工作科还是个临时机构的话,“中央特科”就是专业的情报保卫机构了。

随着组织的壮大,“中央特科”之后又下设了四个科,一科总务,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二科情报,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三科红队,主要任务是惩办叛徒内奸。四科负责筹建无线电。

总务科的重要任务是保障中央会议,另外还负责营救被捕同志。1929年8月,中央军委委员彭湃、杨殷被捕,周恩来在上海策划了劫刑场行动。当敌人将彭湃、杨殷押赴刑场时,红队化装成摄影队半路截击,但由于沿途警戒森严,运送的武器来迟,手无寸铁的红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囚车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罗亦农就义后,他们冒险收殓遗体,还竖立了化名“罗四维君子之墓”的墓碑。

二科完全在搞特务工作。他们的关系遍布社会各界,其中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杨度,也经周恩来批准秘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从左至右)被誉为中共中央情报系统的“龙潭三杰”

密加入共产党。三科红队是行动组织,20多条好汉在上海滩出生入死。罗亦农被叛徒何家兴、贺治华夫妇出卖后英勇就义。红队誓死报仇,满城追杀,何、贺二人刚刚躲到蒲石路居住,第二天就被红队追上门惩罚。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军委秘书,掌握内情甚多,中央命令红队将其除掉。经过精心策划,就在白鑫动身离沪之际,红队将其击毙。

四科的无线电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部署创建。以往,共产党传递情报的方式主要是靠邮政通信,但经由国民党控制的邮检曾担任中央军委秘书,掌握内情甚多,中央命令红队将其除掉。经过精心策划,就在白鑫动身离沪之际,红队将其击毙。

四科的无线电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部署创建。以往,共产党传递情报的方式主要是靠邮政通信,但经由国民党控制的邮检曾担任中央军委秘书,掌握内情甚多,中央命令红队将其除掉。经过精心策划,就在白鑫动身离沪之际,红队将其击毙。

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往往要说毛泽东开辟了农村根据地,创建了红军。那么还应该说,周恩来开辟了城市秘密工作,创建了情报保卫工作。

可以说,“中央特科”的情报保卫工作起点颇高,成绩卓著。国民党印发的《特务工作理论与实践》就曾做如此评价:他们虽无经验可言,然以主持得人,本着学习及创造的精神,定出整个的计划,按照一定的步骤,脚踏实地向

前努力。为时不到3年,竟有惊人的发展与奇异的成就。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啊!

国共大斗法

很快,国共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就有了直接交锋的机会。1937年4月25日,发生了周恩来(延安附近的一个地方)遇刺事件。该事件表明,延安的安全状况十分严峻,毛泽东也几次遭遇危险。一次,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大会,散会后,毛泽东和王明乘坐一辆汽车回家,车上居然混入一个国民党特务。正当特务手持匕首企图行凶时,王明的警卫员及时将其擒住。还有一次,就在保安处的门口,竟有特务向路过的毛泽东投掷手榴弹。

共产党认为要对付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不但要防守,还要以攻为守。距离延安最近的大城市是西安,西安的情报保卫工作就显得格外重要。其实在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时,周恩来在帮助张学良和杨虎城对局面的同时,心思缜密的周恩来在返回延安前已经在西安留下精到布局:设立公开、半公开、隐蔽的机构3个。公开机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为“特科”时期的无线电专家伍云甫;半公开机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为老地下党员欧阳钦;隐蔽机构西安情报站,负责人为前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其中,西

安情报站发展了诸多重要的关系。胡宗南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侦缉队长肖德等,都秘密为中国共产党服务。周恩来安插到胡宗南身边任副官的熊向辉,也由西安情报站联系。

1941年初,国民党突然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残酷的现实再次提醒中共中央:必须预防突然袭击,进一步加强情报保卫工作。194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以下简称中情部)。

中情部是在原中央社会部(以下简称中社部)的基础上,与军委总参谋部的一部分合并而成。中情部与中社部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要任务是军政战略情报的获取与研究。中社部部长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长,副部长3人: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康生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政治运动,王稼祥因病没有到职,叶剑英来得不多,部里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李克农主持。当年“中央特科”的“龙潭三杰”,钱壮飞在长征途中遭到敌机轰炸殉难牺牲,胡底在长征中被叛反错杀,只剩李克农一人,被公认为党内的情报专家。但此时共产党情报战线的宿将干才,纷纷走上情报第一线。周恩来驻扎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负责与国民党中央联络,同时领导中共南方局的秘密工作。南方局的情报关系系打入国民党深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军统、中统和宋子文、孔祥熙、白崇禧、陈诚、戴笠身边都有秘密共产党员。

共产党的新战术:长期隐蔽

国民党中统专门负责反共特务工作,局长徐恩曾此时敏锐地看到中共已经“实现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立即派人潜入延安,从抗大得到一本教材《党的策略路线》。徐恩曾从中判断共产党情报部门的新战术是:“就是要每一

个地下工作人员,人人都有正当的职业,生活言行都和普通人一样,让别人丝毫看不出他是共产党员,这就是共产党新地下战术的特色——长期隐蔽。”徐恩曾自诩为反共专家,自称“在抗战以前,共产党的任何最高机密,我们都清清楚楚”。那时,中统的侦破常常令对方防不胜防。可是,此时的徐恩曾却陷入困惑之中,“共产党这一套新的战术,带给国民政府无穷的困扰,我更是首当其冲。”

随后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给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而此时的国民党情报工作却走入困境。全民抗战,使共产党有了合法地位,有权谴责政府对人民采取特务手段,饱受国民党特务欺凌的民主党派人士也同声响应。由蒋介石一人控制的中统、军统声名狼藉,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是怨声载道。徐恩曾叹道:“共产党对于特务的攻击,就是这样。天天如此,月月如此,穷年累月,永不懈怠地宣传下去,一般人的心理上便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其感染……起先只是共产党员单独在骂我们,别人没有搭腔,后来社会人士对我们也投以憎恨的眼光,甚至自己阵营的同志也不相信我们。我是感到孤立了,我的同伴们,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是一件‘不名誉’的工作。这一时期,是我的工作最感苦闷的时期,反过来说,当然是敌人最感称心如意的时期了。”

徐恩曾认为国民党特务是共产党骂的,可是国民党掌握的宣传手段比共产党多得多,为什么不反过来把共产党的特务也骂臭?这是因为,共产党的特务工作不主张采用下三滥手段,而是巧妙地将秘密情报工作与公开的统战工作结合起来,广交朋友。

(摘自《中国秘密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金城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拾音阁

贾磊磊的多元阐述

杨弋彬

“反右”“文革”“插队”,他们还经历了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90年代的意识形态之争,新世纪以来的文化产业化进程,他们同时对过电影体制的改革,同样经历过“好莱坞来了”的产业局面。

当代人的选择当然是多元的,更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以谁为认同对象并投射自己的理想。在书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到他所推崇的,陈凯歌电影体现出的人文情怀、冯小刚用商业元素改写主流电影的积极意义、张艺谋的极致追求。书中还有大量篇幅涉及武侠电影,徐克的视觉奇观研究、吴宇森的暴力美学研究。贾磊磊曾用两部专著和一部系列电视专题来研究武侠电影,他对武侠片的历史演进、美学特征、武侠精神、作者风格都有独到的见解,武侠电影也实在是他志趣所在的一种电影类型。我们大抵可以说,贾磊磊最关注的一是第五代导演,一是武侠电影。

作者并非就电影论电影,并非只是专注于研究导演或电影类型,他的论述都指向电影之外的现实语境,他旗帜鲜明地主张电影的道德价值和建构功能,认为电影应该综合文化、政治和艺术的功能,在一个价值体系坍塌的世界里,电影仍然应当承担社会道德价值建立的责任,给人以精神力量,给人以慰藉和启示。《什么是好电影》里,有一个词常常出现,即“核心价值观”,这个关键词标志着贾磊磊电影理论的分界点,或者说转向,可依此把他的电影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即电影本体阶段和电影文化研究阶段。在前一阶段,贾磊磊更关注电影美学、电影本体、电影作者研究;而后一阶段,他更多地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等联系起来。所以电影《集结号》的出现,带给他的可

称为惊喜,他在文中一再阐述这部市场价值和文化价值兼备的作品对于中国电影的意义:“我们的电影在观众提供了娱乐和教育的同时,是否可能还为我们文化建设提供一种可以转化的‘精神能源’……我们始终看到了主流电影在经济、社会、文化三个向度上的有机整合,中国主流电影不仅具有了经济上的市场竞争力,而且也具有了人文情怀、冯小刚用商业元素改写主流电影的积极意义、张艺谋的极致追求。”

在贾磊磊看来,《梅兰芳》、《集结号》、《超级台风》等影片都体现了这种核心价值。如果说主流电影提供的文本尚不足以支撑核心价值观的整体建构,那么贾磊磊的另一个理论资源则出现出来,他向武侠电影的仁者美学,《七剑》的武侠精神都为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多面参照。

反之,对那些颠覆核心价值观的,贾磊磊严加批判。可以理解,为什么《英雄》和《色戒》让贾磊磊发出了“3000万美元厚葬了中国古代的侠士与刺客的精神;对知己的承诺可以放弃,对暴政的天下可以屈服”“不是我们错了,就是李安错了,两者是理想主义的”,他对电影有寄托、有期望、有责任感,他说:“我想,我们还是应当拍出更好的电影来,用艺术的力量来证实:凡是正义的、美好的事业一定是能够被人类普遍认同、共同拥戴的,而且它一定是符合人性的,不论它的代价是个人情感还是生命,我们应当坚信这个历史的事实。”

(《什么是好电影——从语言形式到文化价值的多元阐释》,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巴西百年老报停印“转网”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毕玉明)

巴西里约热内卢市拥有119年历史的《巴西日报》自近日起停印出版,成为巴西第一家只以网络版形式存在的报纸,每月订费为9.9雷亚尔(约合5.6美元)。

《巴西日报》网站当天在首页刊登了题为《巴西第一份100%电子报纸亮相》的文章,巴西总统卢拉在文中赞扬了《巴西日报》的光荣过去,强调巴西需要好报纸,而不管传播平台是什么。

尽管《巴西日报》的管理层将“转网”称作“面向未来的一步”,但很多报业同行将这一举措称为《巴西日报》的“死亡”。《巴西日报》曾经的竞争对手、位居巴西发行量第二位的《环球报》以《永别了》为题辟专版就此进行了报道。

《巴西日报》8月31日出版了最后一期印刷版。当天,曾在该报工作的一些员工在里约热内卢市中心示威游行,要求报社发放拖欠的工资。据巴西《圣保罗报》报道,《巴西日报》的劳工债务已高达3000万雷亚尔(约合1700万美元)。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多位老员工因拖欠工资起诉《巴西日报》。

作为巴西最重要的报纸之一,《巴西日报》1891年4月9日在里约热内卢创办,在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曾在印刷、内容和管理等方面进行过巴西报业史上先驱式的改革。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该报开始出现经营危机。

《哈利·波特》作者捐建神经性疾病研究所

据新华社消息 据英国媒体报道,近日,小说《哈利·波特》作者J.K.罗琳捐出1000万英镑用于在苏格兰建立一所多发性硬化症研究所。

罗琳表示,她相信这所建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大学内的研究所将成为该领域世界一流的研究中心,并希望研究人员能够解决更多难以治愈的神经性疾病,例如阿尔茨海默氏症、帕金森氏症以及运动神经疾病等。研究所计划在一年内完工,并以罗琳母亲的名字命名。罗琳的母亲死于多发性硬化症,享年45岁。罗琳说:“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支持这类病症的研究和治疗,能够建立这个研究所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目前,大约10万英国人受到多发性硬化症的影响,而苏格兰是这一疾病的高发地区。

《贵妃的红汗》:记录古代美容护肤之道

本报讯 女子爱美,古今如此。近日,曾经写过《花间十六声》、《画堂香事》等作品的孟晖,通过大量史料的考证,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女性洁面、护肤、美容的随笔,并汇集成新作《贵妃的红汗》,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古代女子的美容护肤之道。

《贵妃的红汗》讲的是中国古代比较重要的几类化妆品,妆粉、头油和胭脂等的制作法,以及古代人是如何清洁身体的。孟晖说,古代的护肤品原料基本上

来自天然,并且很多美容护肤配方在各代的医典里都有记载,也就是说,古代女子有时自己制作护肤品是要“问医”的,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量身制作”,并且这种私人化的配方并不是富人的专利。孟晖说,古代人会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追求着自己的美容时尚,并不是像今天人们想像的,古代的平民就不护肤、不美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到宋代就出现了专门出售洗洁用品的花药铺,到明清时期就产生了大批的化妆品店。(沈卫娟)

《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

陈友仁这位出生在特立尼达的华侨,一个有名望的正直的法律师,1912年从伦敦踏上了回到故土的路,并以革命者和外交家的身份,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他在凡尔赛和会期间,拿到了美国国务卿和日本赴美特使签订的秘密协定,其中就有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省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条款,他立即抄送给孙中山,最终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从而激起了爱国学生和民众的激愤,这就是五四运动;他曾在北伐战争中,作为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坚持收回被帝国主义霸占的汉口和九江租界……作者以细腻的笔调,记述了陈家三代革命者形象——陈桂新,大平天国的将领;陈友仁,民国外交的风云人物;陈依范,时刻为中国革命奔走呼号的画家和新闻工作者。

(陈元珍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9月出版)

《梁羽生散文:生花妙笔侠影》

梁羽生先生一生有35部武侠小说传世,更有50年写散文如繁星无数。本书辑选梁先生关于诗词楹联、古今书话、谈史小识、戏闻杂谈、旅游记趣、棋坛闲话等方面的散文,当然,关于他的武侠姻缘自然也不会遗漏。这本书,是梁先生生前编定的最后一部文集。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随手拈来,便见其文史哲兼诸方面之功力;信笔写去,便有广博蕴藉、风趣幽默之兴味。中国象棋七大高手的棋风该如何总结?“万岁”从来多短命,历朝皇帝的平均寿命是多少?许多我们平时想都不曾想的事情,到了梁先生笔下,不仅让人长见识,更让人思考其弦外之音。

(梁羽生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8月出版)

《安史之乱与盛唐诗人》

该书稿通过对安史之乱前后的诗人群体及其创作的研究,认为在安史之乱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诗歌层面上的盛唐气象仍在延续,只是诗人在保持激情昂扬的同时,多了一份冷静的思考,一份务实的精神。

(吕蔚著 中华书局2010年8月出版)

《孔门理财学》

《孔门理财学》是第一本总结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著作,书中大致梳理了中国传统学术中关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脉络,跨越历史、法律、经济等多门学科的研究著作。本书分5个部分,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分别讨论了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一般经济学说及其在消费、生产、公共财产方面的思想。该书是中国欧美留学生第一部以中国为题材且在欧美国家出版的博士论文集,是20世纪早期“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名著,也是国人在西方刊行的各种经济学科论著中的最早一部名著”。

(陈焕章著 中华书局2010年8月出版)

《富士山与日本人》

对中国人来说,富士山也许并不陌生,因为富士山是日本的最高峰,是一座闻名于世的圣山。很多去日本的人可能都会以一睹富士山或攀登富士山为幸事。但对日本人来说,富士山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山?它在日本人的心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该书汇集了日本绘画、宗教、文学、教育等领域的13位作者的文章,全方位地分析了富士山与日本人的关系以及富士山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

(〔日〕青弓社编辑部编 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中国辽瓷研究》

该书从阐述辽瓷的基本概念和辽瓷学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出发,系统地介绍了辽瓷产生的历史背景、辽瓷产地的自然环境与生产条件以及辽瓷的地理分布,详尽地叙述了辽代城址、陵址、塔基、辽墓出土的辽瓷、辽墓壁画和画像石上反映的辽瓷,以及大量发现的辽代瓷窑址,在分析和研究上述资料的基础上,论述了辽瓷的编年、辽瓷的工艺、辽瓷的纹饰与作款,以及辽代陶瓷产生和结束的时间和地域。作者佟柱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荣誉理事。

(佟柱君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粉丝力量大》

没有粉丝,哪来偶像?镜头的焦点永远是偶像,但有了为明星默默付出的粉丝才成就了今天的偶像。《粉丝力量大》是国内第一本写给粉丝的书,第一本探讨粉丝文化的书。该书从粉丝与偶像的关系出发,叙述了偶像崇拜与粉丝文化的形成,分析了现代社会中的粉丝现象,解答了粉丝崛起背后的社会意义与影响。

(张楠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